

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

外來佛教組織的移植

弘法團體機構、個人在其本土打好基礎後，不約而同地擴展到海外去，那是自然的發展。廿世紀七十年代始，這種趨勢開始普遍，漸漸成為熱潮。原來這種向海外弘法的做法，早已有先例，二十世紀初，香港亦有個別法師到美加夏威夷等地弘法，有偶而到訪，有移民落地生根。可是皆不成氣候，亦乏組織性，計劃性，功效當然不彰。

海外力量的進駐，產生明顯效果及旋風式熱潮的法師，要數八十年代星雲法師來港，成立駐港機構，以台灣模式在香港開展，配合每年一度的親自來港，在紅磡體育館作三天演講，內容融合佛法及生活化的內容，如佛教的財富觀等，深受歡迎，聽眾超逾萬人，這在平淡甚至被歧視的香港佛教，簡直不可思議。演講後，星雲法師與不同的信徒群組聚會，加強培訓及組織，為日後的弘法事業打好基礎。從此，香港佛教的地位不斷提昇，信徒倍增，出家人數持續，扭轉早期沒有人出家承繼聖教的劣勢，亦改變了信徒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的劣勢。往後，台灣不斷有法師及團體進駐香港，互相輝映，其中較為突出的有聖嚴法師及他的法鼓山。他們的努力為香港佛教帶來很大的動力及衝擊，使香港佛教欣欣向榮。

原來早於廿世紀初有敦珠法王的金剛乘學會進駐香港佛教，雖然沒有旋風式的效果，亦在背後默默地影響著香港佛教。及後有大寶法王的噶瑪迦珠佛學會、創古中心、大乘佛學會等密宗中心駐錫，當各派系及團體成立，做成一股潮流，自然吸引海外別的組織紛紛到來，形成一股風氣。這皆有賴本土人士的支持。在潮流刺激下，紛紛往外地引進海外團體，在內外合作下，為香港佛教引來新動力，而自創式的成立團體，本土式的運作，卻難成氣候。縱觀各團體的成立，必有其各自賣點，如標榜某位法師；某個海外團體運作的移植；某種法門；某位佛菩薩。這樣才能使組織有目標，有對向，如果用教內術語形容，則為受到加持。這種「外勞」式的運作，成效顯著，是上世紀末的普遍方式，為本地佛教帶來新動力，新思惟。香港佛教崛起，這種模式功不可沒。

從歷史上看，早期香港佛教如一潭死水，雖經本土人士不斷努力，皆不能有所突破，只有依靠外來力量，甚或往外「取經」，再回來奮鬥一番。外來力量，最先由大陸的北僧南移，繼而是海外團體的進駐，形成一番激盪。可是，本土團體未能有所創發，亦不能有所主導，只能依附他人，可說獨立性不足，自主自立能力不夠。可是，本土人士的功勞亦不容抹殺，畢竟在地利的優勢，人力資源的補給，對當地環境的嫻熟，乃至捐募方面，皆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。況佛行事業不應分本土與外來，應是同家同源。

佛教本是世界性，普世的宗教，可惜因種種原因，未能正知正見地普及與深化。尤其在歐美地區，極長的歲月下仍未能植根，直至上世紀才開始被重視，首先由日本的禪學蔚然成風，繼而有西藏的喇嘛創設道場，研究風氣亦在各個學府進行。只可惜漢傳佛教因為某些原因，不被西方認識，做成很大的缺失。而各學派，傳統在西方的發展，仍須多加努力，以彌補西方在漫長歷史中沒有佛法的過失，在世界一體下，這無疑是亞洲佛教的重責。